

读懂父亲的“味道”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

过去24年来，很少有人知道广东韶关的黄文静家究竟是做什么的。

本来差一点，她就能拥有一个做点心的爸爸。无奈从她出生后，他就转了行，工作时一身臭味。爸爸干活时，读小学的黄文静总是站得远远的。

她的妈妈也随时可能消失。比如包粽子包到一半，接到一通电话，妈妈拿出工具就走了，干完回来再接着包。

在其他同学的爸妈“在什么公司工作”的氛围下，自己家的这份工作，她觉得“和捡垃圾的没什么区别”。反正她从来没告诉过班上任何一个同学，她的爸爸是抽化粪池的，妈妈是通厕所的。

小学班主任家里的厕所堵了，把黄文静私下叫过去问：你爸是不是通厕所的？

“不是吧，谁说的。”她装糊涂。老师说，是你哥说的。

她回家跟老实的二哥打了一架。“他也觉得自己做错了，后悔得不得了。”黄文静说，这原本是黄家3个孩子共同的秘密。

到了她读五年级的时候，在广东韶关四处派发“专车吸粪”名片的父亲黄永鸿发现，自己很难再把女儿叫出去陪他干活了。从那时开始，此后10年，黄文静都没有坐过父亲那辆弥漫着臭味的吸污车。

直到今年，她拍了一系列视频，把这个秘密公开了：她的爸爸有时会钻到化粪池里去清沙，当他出来的时候，头上、脸上，都沾了粪水。

过去20多年，在共同的生活目标下，黄家人很少面对面地讨论这份职业的“不光彩”。“好像大家都心有灵犀，我爸妈害怕伤到我们的自尊心，我们也怕伤到自己的自尊心。”黄文静说。

黄永鸿记得，两个儿子上了初中，终于开口跟他商量：能不能换份工作。他认真考虑过，但觉得自己“文化水平太低”，“就怕干其他的又干不好，到时候（供）他们读书出什么问题”。

20世纪90年代，他初中辍学从山里出来，进玩具厂干一天能挣7元，在建筑工地做小工一天挣20元，做点心学徒时也差不多。唯独做疏通，通一个厕所就是50元。“有时候一天通几个，你想一下。”黄永鸿说。

黄文静记得父亲提起过自己的同学聚会，“说人家都穿得很好，又说是什么公司老板之类的，他



黄文静陪父母一起工作。

受访者供图



黄文静坐在爸爸的吸污车上。

受访者供图



黄文静和爸爸在吸污车上。

受访者供图

全程都没有发言，就觉得自己跟别人不是一类人”。

工作时，有人不愿意他把吸污车停在路边，张口就是“你一个搞厕所的……”有次管道破裂，污水溅到路人身上，被人指着鼻子骂，黄永鸿也很少吭声，他说自己“尽量不生气”。

干完活，他会开着车去水边捞小鱼，回去喂家里的乌龟。黄永鸿养了100多只龟——包括从化粪池里捞出来的一只，还有4只鸟、两只猫。他几乎在天台打造了一个生态园，里面的三角梅开得极盛，各式各样的花盆装饰在鱼池之间。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，他都在装点这里。

“我爸常年都是这样子，看不到哪一天他会很沮丧，他说不开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”黄文静说。对3个孩子，他有时这样安慰：“我们没办法，读书没读到，你们就读多一点文化，就不用干我们这些活。”

掏粪20多年，把孩子们养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。去年，在深圳工作的黄文静又发起一次讨论，认为父母年纪大了，可以做点轻松体面的工作，更重要的是，3个孩子都要考虑找对象的问题，害怕对方嫌弃“你家是做这个的”。她过去跟历任男友都这样说：“我爸是做工程的。”

这次讨论依然没有推动什么改变。如黄永鸿所说，“人好多时候，由不得自己走哪个路，你走开了，就要走那个路”。更何况家里前几年刚盖新房，还有些欠款未还。他开着吸污车，总在盘算哪条街上有几个化粪池很久没抽了，“怎么还不堵？”

“回想以前，自己的决定也不想父母去干涉，为什么我现在要做同样的事情。”黄文静说。即便她带着文身、打着唇钉回家，父亲也没有强硬地干涉过。

“一开始是不接受的。”黄永鸿说，他担心这文身影响女儿嫁人，但实际上，他挺喜欢看人身上文点图案，只不过自己干服务业，“要进人家里的，搞一个（文身影响）不好”。

去年，黄文静的工作遭遇瓶颈，她辞职回家，想休息一段时间。黄永鸿也接受。“她已经成年了，她有她的思想。”

有一次，为了搭便车去找朋友，黄永鸿在去干活的路上捎了女儿一程。她爬上那辆黄色吸污车的副驾驶位，发现视野很宽阔，“觉得很酷”。但当车子开出去的时候，她就默默地把窗户摇了上去——尽管玻璃是透明的。

父亲真正工作的场面，和她小时候想象的不太一样。有些雇主会给他倒水，问好，寒暄几句。“说说笑笑的，（雇主）也不会觉得他这个职业的人，不能跟自己去交谈，对我爸是很尊重的。”

小城与 AI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郭玉洁 文并摄

“你是什么模型？”“我感觉我都要忍不住笑出来了。”“其实你可以改进一点的，你讲得太快了，而且你讲的故事没有感情。”

5月底，在山西省永和县一个靠着黄土坡的小楼里，这些语音条在一位数据标注员的电脑上一一跳出。

数据标注员是位30岁上下的女人，她挂着耳机，紧盯屏幕，移动鼠标，敲击键盘。她要查看机器给出的语音转写是否正确，如果有误，反复回听，确认字句，作出修改，或给出“方言严重”“噪声太大”“多人同时说话”等标签。这是在给机器“改作业”的过程。

有人说，机器变得聪明和这个干旱的小城有些许关系。

在头部互联网公司参与AI数据标注工作的张佳佳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，外包团队标注好的大量数据将被交给算法工程师，再次“喂”给机器，进行下一步训练。如此重复训练，机器将会越来越能听得懂人话。

数据，要人类进行属性标注后，才对机器产生意义。

在山西省永和县这个数据标注基地里，给人工智能“打工”的业务持续了5年。从最简单的——圈出图片中的“苹果”“水杯”“箱子”开始，到观看一段与股票基金涨跌相关的视频，从中提炼出信息。由易到难，一条数据标注的单价从1分钱到20元不等。5月底，在一组数据标注员教AI听人说话的同时，还有十几位标注员专注面对人脸，精准标出眉毛、眼睛、嘴唇；十几个人一整天在盯着智能货柜的实时抓取画面，看人手里拿的商品与机器给出的答案是否吻合——一人一天要点击约2000次。

大量数据对人工智能认识、理解世界有重大作用，是华人科学家李飞飞在13年前向世界证明的。

2012年，一个名为AlexNet的算法成为新一届ImageNet大规模视觉识别挑战赛的冠军。

这种学习方法可以理解为一种笨方法，例如用千张各种小提琴的照片，让机器“认”出小提琴，整个项目总计需要约2000万张图片，可能需要从数亿张图片中筛选。

数据标注行业流行着一句话，“有多少智能，就有多少人工”。

大约2007年，在斯坦福大学的李飞飞寻找人工时，想到的办法是用时薪10美元的价格招募本科生，但用这种方案，完成这个项目需要19年。后来，一个允许全球用户加入的众包平台上，近5万名标注者参与其中，帮助完成了这个有划时代意义的实验。有人说，没有这个数据集，“就没有现在的深度学习革命”。

这个经济不算发达的永和县，数据标注员们感知到自己标记的数据在改变世界的时候不多。生活中，也很少有人关心他们在这做什么，比起训练人工智能，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一份工作。这些数据标注员多是中专及以下学历，约90%是女性，在县城，她们看中这个工作双休、坐在办公室，允许把放学的孩子接过来写作业。

2020年，人工智能训练师正式成为新职业，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。数据标注员是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工种之一。冯琴和李瑞琴都是在这一年成为数据标注员的。

几年中，李瑞琴“最稀奇”的一次体验是，给无人驾驶汽车业务做道路标注任务时，居然有一次



山西省永和县唯一一家电影院，开在主干道的路边，距离靳红艳上班的数字人才中心只有约200米。

看到了永和。图片上是一个熟悉的路口，是她去丈夫老家村子的必经之路。她想，说不定很久之后，AI汽车也会到这儿来。

AI汽车此刻距离永和县还有点远。这两年，这里一小半业务来自各类无人驾驶汽车项目，数据标注员们眼前是采集车收集来的各路路面图片，他们要标出红绿灯、车道、行人、路障。从路标来看，图片大部分来自“南方的大城市”。

永和县城只有两条主干道。除了大型货车，路上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——城区狭小，四面环山，电动车难骑上附近的陡坡。冯琴说，只需要10分钟，就可以骑着摩托车贯穿县城。永和县是山西省人口最少的县，少见6层以上的高楼，吕梁山脉留给这个县城的建设空间不多。两条主干道的交汇处，是县城最大的活动广场，她们的办公室就在广场对街不远处，是县城的核心位置。

在这个县城，这家公司属于高新科技企业。永和县工信局、科技局局长冯利对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介绍，这家公司是目前县城唯一一个数字技术相关的企业，县里其余与科技有关的工作，大部分是农业技术指导，对接农技人员和农业合作社。

在屏幕之外，这些AI数据标注员们面对的是一个传统的世界。

王丽娜哪是在2020年成为一名数据标注员。十几年前，王丽娜高中毕业后去了太原，在太原打拼5年。在4S店做销售时，她最高拿过一万元的月工资，但工作也忙，很少走着去上班，总是一溜小

跑。和人打交道很累，“得让人把钱花了，还得让人高兴”。下班了，还得随时接客户电话，解决售后问题，提供情绪价值。

那段时间虽然累也充实，“上的是社会大学”。她回县城，更多是因为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走不开了。她和丈夫开了个家具店搞装修，但因为永和县城楼房少，生意不太好，没干下去。

那几年，王丽娜陷入郁闷的情绪：“没意思。”“就窝在这个县城了，不顶事了。”

回想起来，是AI数据标注员这份工作让她慢慢接受了在县城的生活——体面、收入在县城不算低，又不像像在外地打工一样那么拼。她的状态慢慢好起来。

也是为了家庭，冯琴在2008年回到了永和县。她曾经在北京做过几年的教育培训。回到永和县，最不适应的是这里一些人缺乏时间观念，说好了时间开会，没人到。她在一家小加油站做了几年会计，总要熬夜。2020年找到这份AI数据标注员的工作，因为业务方多是杭州、上海的互联网公司，她找到了一种在大城市工作的熟悉感，高效、规范，她挺享受这点。

冯琴也很享受这份工作的“新奇”。做了一些金融相关的任务后，她第一次买了基金。她曾跟随公司来到上海参加人工智能大会，走在东方明珠附近的一个路口，她发现曾在无人驾驶汽车业务的图片标注上看到过这里，“就是这，这不是一模一样吗？”大会上集中展示了还未被广泛采用的AI技术，以至于在2025年春晚晚上，看到机器人在舞台上转手绢时，她感觉“一



5月26日，山西省永和县数字就业中心里，正在工作的AI数据标注员。



5月25日，山西省永和县，两条主干道交叉口。

点都不稀奇”。

在DeepSeek成为热议话题的一年前，冯琴就知道了什么是“大模型”。来自互联网公司的业务方会要求他们给“大模型”业务单独分出一个组，对标注员学历的要求是大专及以上。

在末端，永和县的标注员们感受到的是，这两年，他们不需要教AI认苹果、水杯了。任务走向“深层次”：画出苹果的框是不够的，要用文字描述出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苹果”。

数据标注员靳红艳印象深刻的任务包括：把一句话改写得押韵；从一些信息中总结出一个成语；听一段语音，语音中是两人在就保险理赔问题吵架，判断说话人的态度情绪。王丽娜印象深刻的是，阅读4篇童话故事，投票哪一篇写得最好，并说出理由。

作为项目经理，王丽娜开会时会和大家解释，现在的简单任务越来越少，“因为你已经把机器人教会了”，这是必然。

2024年年初有行业报告预测，2024年大模型应用将进入落地期，垂直领域大模型的商业化应用正在加速。

也是大约2023年年底开始，冯琴的老板李林峰感觉到，越来越难给永和县的标注团队找业务。不是市面上没有业务，而是团队成员的学历、背景达不到要求。要求本科学历，甚至有汉语言、医学、法律等专业背景的需求越来越多。数据标注员们手中的任务在变少，从前同时做3个任务，现在只剩一个，薪水随之下降。最近的绩效冠军大约能拿4000元月薪。

20多年来，黄永鸿的吸污车几乎开过了韶关市的每条街道，餐馆、学校、银行、监狱……有人 的地方就有污物。有些雇主会在酷暑时拉根电线在外面，把风扇插上，给他干活时吹。还有雇主留他喝茶，让他用掏过污物的手举起自家的茶杯，客气地表达感谢。黄永鸿打趣说：“收了钱的，不要谢。”对方说，“收了钱，也要谢！”

穿梭于具体的市民生活中，黄永鸿认为，他其实得到了许多尊重。发现这种尊重，也使黄文静感到了一丝放松：“那一刻我就觉得，一个外人都能这样，我凭什么去嫌弃我自己的爸爸。”

她把手机摄像头转向父亲，记录他工作的日常，并试着发了一期视频。她担心会有恶意的评论，“害怕大家看不起这个工作”。但在那期视频里，网友用“最美工作者”“城市英雄”一类的词评价父亲，并称她为“一百分小孩”。

她开始下手去做，帮点力所能及的忙。最先受到挑战的是力气和忍受异味的能力。用铁棍把顽固的污物搅松，或是扛送吸污管，都让她起初几天的肩膀酸痛无比。为了方便干活，她把美甲剪短了一点。而臭味，简直是扑面而来，让她本能地作呕。污物容易沾得到处都是，她回家把干活的衣服都扔了，“手都想捐了”。

黄永鸿开玩笑说，新手要先拿个盒饭在化粪池旁边吃，吃得香的才能入行。这的确成了他们现在的日常。黄文静有时候会去打包两份肠粉，回来蹲在吸污车旁吃。她觉得自己适应得还算快，“这个味道伴随了我的童年，可能有点免疫了”。

跟着爸爸体验工作，她能做的不多，但能看到许多。比如他蹲在地上干活时后背上的汗。也能发现一些细节——他的嘴巴只要嘟起来，就说明现在非常专注。黄永鸿在工作结束时，会习惯性地帮雇主把卫生清理好，因为担心对方找不到愿意处理这种污秽的保洁。“给我教数学的时候教几次不会就要揍我了，跟客户怎么那么有耐心？”黄文静纳闷。

父女俩正在重新创造这份工作的面貌。黄文静买了个文字贴纸贴在吸污车上：“忘了他吧，我掏粪养你。”她用“黄金池”形容化粪池，抽污是“抽金”，自己的工作服则是“粪围感穿搭”。他们嘻嘻哈哈，经常在工作中自我调侃。

“我从未想过要以这种‘行为’去博眼球，因为常人难以理解的场景，是我成长岁月里最熟悉的日常。”黄文静说，“分享与父亲的点滴，是希望把他身上的乐观与温情传递给大家。”

无论生活还是工作，他们正在逐渐获得关注。在回老家的车上，黄永鸿穿着平日很少穿的干净衣服，有点担忧地琢磨：这些视频会不会被老同学看到？村里除了近亲友，还没有人知道他是“搞厕所的”。

在韶关，也很少有客户知道，“搞厕所的”黄永鸿并不是他的本名，只是名片上那么写。他说至少有一半的同行都是用匿名。他的真名是黄伟锋。

黄伟锋小时候梦想当一名画家，老家的墙上现在还留着 he 画的画。虽然没有如愿以偿，他还是成了女儿镜头里的主人公。只有掏粪的黄伟锋，才是黄文静的爸爸。

人工智能的进化还在持续。张佳佳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，“AI时代怎么到来？必定是要把我们的时代交给它，它才能成长起来，各个领域的知识去大量地涌进它。”她说，未来，各行各业 的专家都是人工智能所需要的标注员、训练师。

2025年年初，一位研究生学历的记者转行进入AI公司做AI人文训练师，着重教大模型与人文社科有关的知识、能力。在训练人工智能的体系中，她处在外包数据标注员的上游，是制定标注规则的人。不过她说，从一开始她就明白，这个工种的职业生命短暂。

最近，她在教一个大语言模型写新闻评论。经过多轮提示、修正，她很快感觉，模型写出的评论质量超过自己，“这是肯定的，我的目的就是让它做到这一点”。她觉得教AI和教孩子很像，希望他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怎样教他。参与构建一个美好的AI世界，可以是一种热忱的理想，但她不懂技术，自觉能做的有限。想到未来AI不再需要她去训练的那一天，她说“该怎么办怎么办”，说不定又会有新岗位出现。

比起教AI，永和县的数据标注员们将更多的心力花在真正的孩子上。她们也享受着人工智能的成果，向豆包、DeepSeek和Kimi求助如何辅导二年级的孩子英语、如何写作文，怎么写毕业典礼上的家长发言。

不过王丽娜也希望，“机器也别发达得太厉害了”，给以后的孩子们一些机会。

在“内卷”中的数据标注行业，永和县的AI标注员们有着“佛系”气质，流动性不强，员工不知道自己任务的单价，也很少去打听。老板李林峰还没结婚，一些员工因此相信他会把更多的钱花在公司里，比如给每个办公室买了按摩椅。县城小，很多同事一开始不认识，闲聊后才发现两家人沾亲带故。冯琴说，小县城重人情世故，几年前春节期间接过协助机器识别“福”字的任务，实时任务，需要3秒内判断，需要加班。没有多少人愿意在春节期间加班。

李林峰说，再以后的时代是，人工智能给人类赚钱，人只需要护理机器，享受生活。他想到永和人的性格就是这样——在经济发达的地方，或许有更多比较，但在永和，一家大商场都没有，没什么可比的，更享受当下。至于自己会不会被取代？他觉得所有人迟早都会被取代。

新技术曾经给县城里的女人们带来过一段美好时光。

前两年，这家AI数据标注公司在常住人口仅4万多的县城轰动一时，最多时有170多名员工，有人曾经拿过万的高薪，有人在丈夫的工作因頓時成为家里的顶梁柱。那时大家手头宽裕，周末，这些教AI识字、看图的女人们常常会三五成群聚餐。冯琴说，有次她在县城里一家饭店吃饭，一看，饭店里全是她们公司的人。

最近，有的数据标注员去考了函授大专，提升学历，有人考了AI训练师资格证。虽然有人觉得，考这些也没啥用，还是达不到业务不断更新的要求。

快40岁的靳红艳不怎么有危机感，前两年，她在县城开了一家电影院，能作为另一份职业。电影院也在这条街上，是县城唯一一家电影院，只有一个影厅。她白天做AI数据标注员，晚上和周末排些电影。如果AI有一天彻底不需要她做标注了，她会成为一个全职的电影院老板，放映更多场次电影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张佳佳为化名）